

《乌布西奔妈妈》的史诗特点

郭淑云

内容提要：《乌布西奔妈妈》是一部流传于满族先世东海女真人中的英雄史诗，构成中国北方英雄史诗带的重要一环，并体现了鲜明的特点：阐扬了集体英雄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表现了浓郁的渔猎文化特色；彰显了突出的女性崇拜观念。她具有独特的传承方式和艺术表现形式，在世界史诗园林中独树一帜。

关键词：《乌布西奔妈妈》 英雄史诗 女真 萨满 满族说部

《乌布西奔妈妈》是满族先世东海女真人中的一部古老的英雄史诗。作品以主人公乌布逊部女萨满乌布西奔的一生为主线，记述了她一生的丰功伟绩，塑造了以乌布西奔为代表的群体英雄形象，集中体现了东海女真人英勇无畏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

《乌布西奔妈妈》具有鲜明的渔猎文化特色

众所周知，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大多分布于北方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突厥语族、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和汉藏语系的藏族等民族中。在草原游牧民族中，英雄史诗的蕴藏量极为宏富，分布尤为广泛，具有鲜明的游牧文化特征。这无疑与生活在这一地域内的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叶舒宪据此考察了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与文化生态的关系，认为“英雄史诗的产生主要以游牧文化为现实土壤，游动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民族、部落社会的大迁徙和由此引发的民族冲突与战争，构成了史诗叙述的基本题材，而战争所必需的勇武精神和英雄品格，则自然成为这一类英雄史诗的共同主题。”^①应该说，这一论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生成与流布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但对中国渔猎民族的英雄史诗缺乏应有的关注。

事实上，在以渔猎为生的满—通古斯诸民族中，也曾经历过渔猎民族的英雄时代，英雄史诗、英雄神话和英雄故事广为流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黑龙江省民间文艺工作者对三江水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赫哲人中流传的“伊玛堪”、小兴安岭山地原毕拉尔

^① 叶舒宪：《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的类型及文化生态》，《东方丛刊》1998年第2期。

部落鄂伦春人中传承的“摩苏昆”等英雄史诗进行科学采集和系统考察,论证了“伊玛堪”“摩苏昆”的英雄史诗性和渔猎文化特色。然而,由于学术界对“伊玛堪”“摩苏昆”的史诗性质至今尚未形成定论,其作品的数量、规模以及成熟程度与典型的英雄史诗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致使学术界在考察英雄史诗生成的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等问题时,对渔猎文化生态下英雄史诗的生存形态重视不够。

《乌布西奔妈妈》描绘的东海女真诸部早期渔猎生产生活方式,与渔猎民族的实际生活浑然一体,相互印证。渔猎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在作品中都有体现,衣食住行自不待言,各种生产生活用品也无一不来自渔猎产品。更为重要的是,渔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适应自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特有的价值观念,在史诗中得以独到的表达。如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理念,通贯全篇,并以突出的自然崇拜和生物崇拜的形式加以体现。在《乌布西奔妈妈》中,山川森林、江河湖海都充满灵性,人与自然的和谐尽显无遗。在《乌布西奔妈妈》中,猎手和捕鱼能手成为勇士的标准之一,体现了渔猎民族的价值观。乌布西奔率族众进行的探海活动,更集中体现了海洋渔猎民族勇于探险,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总之,《乌布西奔妈妈》反映了典型的渔猎文化形态,具有鲜明的渔猎生态文化特色。整个作品宛如一幅幅画卷,描绘了古代东海区域的自然生态景观,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渔猎民族生产生活的画面。这种纯然的渔猎风情在世界各民族英雄史诗中实不多见。它不仅使《乌布西奔妈妈》以一种独特的精神风貌呈现在世人面前,也使之成为满一通古斯民族英雄史诗的典型代表,体现了它们的共性特征。作品洋溢着浓厚的渔猎文化气息,展现了东海女真人的渔猎生活景观和独具特色的渔猎文化风情,不愧为一部典型的渔猎民族的英雄史诗。

《乌布西奔妈妈》阐扬了集体英雄主义的核心价值

《乌布西奔妈妈》的主人公及众女英雄形象表现了集体英雄主义的精神品质,它成为史诗作品的核心价值观,并被赋予深刻的思想内涵,也因此使作品迥异于西方英雄史诗的特质。西方英雄史诗的主人公固然具有英勇无畏、不怕牺牲这些英雄史诗共同的品质,但在他们身上也同样表现出个人主义倾向,《乌布西奔妈妈》与之大相径庭。

《乌布西奔妈妈》中的英雄形象不仅具英勇、顽强、执著、百折不挠的优秀品质,更为可贵的是,她们总是与人民站在一起,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了部落的群体利益和荣誉不惜牺牲生命。这一点在主人公乌布西奔及其众弟子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当瘟疫突发,灾难降临东海,人们纷纷逃难之时,乌布西奔勇敢地站出来,亲自进山采药,发明适于时疫的验方,并走进疫区,将自制药汤送到东海各部落民众的手中,全然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当部落战争发生时,

乌布西奔既是指挥员,又是一名战士;为了实现寻找太阳之宫的执着追求和理想,乌布西奔及其三位弟子先后牺牲,当危险来临时,她们首先想到的是集体和他人。乌布西奔一生奔波、操劳,统一东海诸部,结束了战乱的年代,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这既是东海人民的集体意识,也是她毕生的追求,可以说,乌布西奔的思想与行为代表了东海女真人的普遍利益和愿望。集体英雄主义精神在乌布西奔众女英雄身上得到集中的展现。

《乌布西奔妈妈》塑造的女神形象有突出的体现,不仅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相映成辉,更为主人公集体英雄形象提供了思想源泉。其中以乌鸦神最具代表性。乌鸦神本为来自天界的古尔苔女神,是天宫大战时期的一位古老的创世神,“天地初开的时候,恶魔耶鲁里猖獗寰宇,风暴、冰河、恶浪弥天,万物不能活命。阿布卡赫赫是宇宙万物之母,将太阳带到大地,将月光送到宇内,让身边的众神女捏泥造万物,让身边的众神女用露气造谷物,让身边的众神女用岩粉造山川,让身边的众神女用云水造溪河,才有了宇宙和世界。耶鲁里不甘失败,喷吐冰雪覆盖宇宙,万物冻僵,遍地冰河流淌,阿布卡赫赫的忠实侍女古尔苔,受命取太阳光坠落冰山,千辛万苦钻出冰山,取回神火温暖了土地。宇宙复苏,万物生机,古尔苔神女因在冰山,饥饿难耐,误吃耶鲁里吐出的乌草穗,含恨死去,化做黑鸟,周身变成没有太阳的颜色,黑爪、壮嘴、号叫不息,奋飞世间山寨,巡夜传警,千年不惰,万年忠职。”^①古尔苔女神为了给人间取太阳火,误食黑草,变成乌鸦,即使如此,仍终日为人间“巡夜传警”。乌鸦被满族先民奉为灵禽,天性机敏,对灾异等具有极强的反应力,如遇伏兵、野兽、僵尸、烟火时,它能群鸣报警。如发生山火,它能辨别火势,朝着与火蔓延相反的方向振翅高飞。史诗赋予乌鸦为人类“巡夜传警”的伟大职能,体现了东海女真先民对乌鸦习性细微观察和认识。“这是对群体忠诚的极致,寓含着对人类多么深沉、炽热的爱,实际上乌鸦女神是乌布西奔妈妈英雄主义的象征,这种精神是萨满教中所寓含的人类文化的积极基因,是萨满教有悠长文化生命的根本原因。”^②乌布西奔以此教育弟子,要学乌鸦格格,为难而死,为难而生,表现了集体英雄主义的情怀和神话对主人公的深刻影响。

应该说,《乌布西奔妈妈》反映了满族及其先民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渔猎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是适应维系群体生存发展需要而形成的,与其生存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与渔猎民族的坚韧性格、尚武精神相结合,体现了满族及其先民的心理特质。萨满教英雄崇拜哺育了满族及其先民的价值观念、心理素质和精神追求,陶冶了他们的情操,表现为集体英雄主义的精神品质。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基质铸就了

① 鲁连坤讲述,富育光译整理《乌布西奔妈妈》,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1页。

② 王宏刚:《萨满教英雄崇拜与北方民族的崛起》,郭淑云主编《萨满文化研究》第1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9页。

史诗作品的精髓,使之有别于其他英雄史诗而独具风韵。

《乌布西奔妈妈》体现了浓郁的女性崇拜意识

英雄史诗的主人公均为男性,高扬男性的阳刚之美和英雄气概。《乌布西奔妈妈》独辟蹊径,不仅成功地塑造了女主人公形象,展现其独具的英雄品质,而且创造了一大批勇敢、智慧、富有创造性和牺牲精神的女性形象群。这种浓郁的女性崇拜色调与内涵,不仅使其在英雄史诗的百花园中绽放异彩,即使在世界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中,亦实属少见,反映了满族及其先民突出的女性崇拜意识和独特的文化价值。

满族诸姓萨满教女神及其神话丰富多彩,这方面已有大量的资料披露,学术界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①,此不赘述。近期笔者参与整理与研究的东海女真人后裔吉林乌苏瓜尔佳氏萨满文本^②中,计有一百多位神灵,其中女性神占有很大比重。女神主要分为妈妈神(奶奶神)、德德神(姨娘神)和格赫神(姑娘神)三种类型。

20世纪30年代,吴纪贤在《吴氏我射库祭谱》中曾记载:“吾族公祭,均祭至高无上之母亲神灵,神名之重之多,譬如兴安之树,不可数指也。”^③吉林省九台满族杨氏家族、琿春库雅喇等原东海女真后裔至今仍保留祭祀“妈妈神”的习俗。《乌布西奔妈妈》及其他满族民间文学作品体现的女性崇拜意识,正是以这种文化传统为土壤的。

《乌布西奔妈妈》的女性崇拜意识通贯作品的全篇,并全方位地渗透神界、人间和萨满界,使女性成为作品的绝对主角,也成为其所表现的东海女真社会的主体。首先,作品以惊人的想象力和卓异的创造力建构了一个庞大的女神神系。此神系由三个层级若干女神群组成,二百余位职司明确的女神分属于不同的神群,各有统领,行使各自的职责。《乌布西奔妈妈》虽是一部史诗作品,以世俗英雄的业迹为主线,但其对女神神系的构建可与满族创世神话《天宫大战》相媲美,二者交相辉映,呈现了既相互关联又自成一系的女神系列,蔚然壮观。神系中的三位主神天母阿布卡赫赫、地母巴那吉额姆和星神卧勒多赫赫均为女性,所有善神也全都是女性,树立了女性的绝对权威和至高无上的地位。

其次,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乌布西奔的人物形象,散发着人性与神性交融、神圣与人本结合的璀璨光辉。作品着力塑造了乌布西奔这样一位超凡的英雄人物,集各种优秀品质和多重社会角色于一身。她以安天下,济苍生为使命,施德政,恤百姓,广教化,福泽东海诸部,是一

^① 参见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富育光、王宏刚《萨满教女神》,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 满族乌苏瓜尔佳氏萨满文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宋和平先生翻译,谨此致谢。

^③ 该资料从富育光先生处获得,特此感谢。

位殚精竭虑,勤政爱民的政治首领;她精谋略,长智取,创战法,善攻心,以德降敌,以智克敌,常常以少胜多,不战而胜,是一位运筹帷幄、足智多谋的军事统帅;她胸怀天下,广施仁德与教化,通过经济、文化、医疗等多方面的交流,促进与周边部落与东海诸岛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乌布逊的势力和影响扩向四方,是一位外交首领;她发明文字,创编舞蹈,创历法,定年号,废陋习,建制度,是一位文化英雄;她尝百草,制药汤,创验方,发明瘟疫隔离法和医疗方术,悬壶济世于东海一方,是一位良医。

在满族民间文学中,反映女性崇拜主题的作品可谓俯拾即是。《尼山萨满》以一位舍己救人的女萨满为主人公;《天宫大战》以五彩缤纷的色调描绘了三百女神的神奇世界,她们开辟宇宙,造人造物,建立宇宙秩序,开天地万物之始;《恩切布库》中明言:“女人是生命之源,女人是生命之本。艾曼最敬重女人,形成良风,世代沿袭”。^①《东海窝集传》中的某些风俗更体现了女尊男卑观念,如丹楚要先向自己的妻子请安,才能双双出来拜天。他嫁到女方后,必听候女方的安排,履行一定义务,还必须忠于妻子。这些女性英雄形象的塑造和尊崇女性观念的表达,使乌布西奔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得以彰显。

毋庸置疑,《乌布西奔妈妈》以一种理想主义的表现手法,将东海女真人各种优秀品质集于主人公一身,将她塑造成一位尽善尽美的“完人”。如果说乌布西奔的非凡身世和萨满身份,使其具有与生俱来的神性,那么,她降临人间后建树的一系列卓著功勋,则进一步强化了她的神性。可以说,作品的叙事过程就是对主人公神化的过程,是一个创造人间真神的过程。不难看出,作品对乌布西奔形象的神化和圣化,凸显与强化了女性崇拜意识。

应该指出的是,乌布西奔只是作品中东海女真人女酋长、女萨满、女英雄的典型代表。作品创造了多位女酋长、女萨满形象,如黄獐子部法吉凌的慈爱、勤政,乌布逊已故老酋长多罗锦的宽厚、平和,乌布西奔萨满弟子乌布勒恩的聪明智慧,都尔根的沉着冷静,都尔沁三姐妹的重情重义、富于牺牲等。乌布西奔及这些与之并行不悖、相映成辉的女性群体艺术形象,昭示了《乌布西奔妈妈》尊崇女性,以女性为本位的思想内涵,在英雄史诗中具有独特的韵味和风采。

《乌布西奔妈妈》的产生与传承方式独具一格

史诗传承不外乎口头传承、文本传承或两者兼备等形式。世界一些著名史诗大体都经历了口头文本——书面文本——口头、书面文本并存的传承轨迹。因此,与民间文学其他体裁相比,史诗的口头传承与文本传承的关系更为密切,二者相辅相成,并经过不断加工和修订,

^① 富育光讲述,王慧新整理《恩切布库》,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3页。

才最终形成一部完整的艺术作品。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多为活态史诗,许多史诗至今保持口头演唱的传统,书面文本的形成较为晚近。

《乌布西奔妈妈》的产生与传承具有独特的轨迹,并呈现出鲜明的传承特点,即图画符号文本与口承文本相结合;萨满讲唱与文人参与整理、传承相接续。

据史诗文本记载,《乌布西奔妈妈》得以流传于世,功归乌布西奔的三位萨满弟子特尔沁、特尔滨和都尔芹及其弟子们。在三位萨满的倡导和主持下,用乌布西奔生前创下的图画符号文字,将其事迹镌刻在锡霍特山德烟山洞窟中,创造了史诗最初的图画符号文本形式,并开启了依图讲唱史诗的传统,使《乌布西奔妈妈》的传承方式别具一格。

从传承的途径、主体和听众等因素考察,《乌布西奔妈妈》的传承可分为两个时期,并呈现出不同的传承特点。前期指东海女真人在现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锡霍特山区原住地生活时代,是《乌布西奔妈妈》形成与部落内部萨满传承时期。这一时期,《乌布西奔妈妈》的流传形式既非完全保持口头传承的传统,亦非以文字形式流传于世,而是以图画符号为依据,以萨满讲唱的口传形式为传承方式,在族群内部传承,从而形成图画符号文本与口头传承相结合的模式,二者相得益彰。作品的流传以及不断丰富,也是在部落内部由萨满实现的,即在定期祭奠乌布西奔的仪式上,由萨满依镌刻在德烟山古洞中的图画符号唱诵,图画符号为萨满口头传承提供了讲唱提纲,起到帮助记忆的作用;口头传承则在图画符号文本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与完善。当时作品传承的语言只能是东海女真人的土著语言。

由此可见,锡霍特山时期的《乌布西奔妈妈》实质上是东海女真人祭祀祖先英雄的祭文,主祭者萨满是以萨满教巫师的身份讲述部族英雄的业绩,受众则是部族族众,为祭祀仪式的参祭者。这种传承特点彰显了在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下作品的生成、传承特色及本质特征。从中不难看出,宗教性是《乌布西奔妈妈》的本质属性,至于文学性等皆为派生的属性。

《乌布西奔妈妈》流传的后期,其传承途径、传承主体及受众、传承语言与载体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形成与前期迥异的传承特色。这种变化与特色的成因完全是由于外部力量导致东海女真人后裔巨大的社会历史变迁人为地中断了史诗传承的传统,改变了史诗传承的轨迹。

19世纪中叶以后,沙俄军队入侵中国东北,染指东海女真人世代生息之地,并最终于1860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使中俄两国疆域及被割占地区的居民发生重大变迁。随着中俄两国疆域发生的剧变,东海女真人后裔原住地锡霍特山一带也被划入俄境。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使得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几成定制的史诗传承传统被迫中断,从而使《乌布西奔妈妈》进入一个

新的传承时期。随着东海女真后裔内迁绥芬河、东宁等地,远离了原始洞穴的岩画母体,脱离了原有的传承环境,《乌布西奔妈妈》的传承模式和传承轨迹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并表现出突出的特征:由原来的部族内向性传承,渐为外向性传承,并逐渐完成了由部落内部传承向满族民间区域传承的演变,与此相适应,史诗的流传范围也突破了原有的地域,扩大到东北相关满族地区;由萨满传承为主,转变为萨满传承与民间传承并行,并以满族文人传承为主的局面;由原来的女真语、满语传唱,后因通晓满语的老萨满谢世和满语的渐次废弃,渐用汉语讲唱;由原来的依洞穴符号讲唱,后因远离洞穴的岩画母体,造成记忆不详或有误,在传承中形成一些变异故事。从体裁上看,既有说唱体,也有叙述体;从篇幅看,既有长篇,也有短制。

部落内迁与分离导致的史诗传播环境的改变,也使东海女真后裔固有的社会基础以及史诗的传承人、受众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均以血缘关系为社会组织基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保持聚族而居的社会结构,并形成特定的组织系统。然而,内迁后,作为东海女真人“神圣经典”赖以存在的血缘组织和聚族而居的传统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被打破,内迁部分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使《乌布西奔妈妈》自身发展的社会基础受到破坏,传承人和受众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种状态促使部族的文化记忆日渐走向衰落,史诗传播的活态语境已不复存在。美国学者特里斯特拉姆·普·科芬在论及美国民间文学时说:“民间文学好似树上的绿叶,海岸边的贝壳,把它从生长的自然环境中采摘来,它就会枯萎,失掉原来的美。只有在口耳相传的环境中,人们拿它交换着说和听,没有把它记录下来置于凝固不变的形式中时,民间文学才繁荣昌盛。”^①这说明民间文学是活的文学,它和一切活的生命物质一样,都生长在特定的环境里。山野里的鲜花,如果离开了它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就失去了原来的美,甚至枯萎。民间文学如果离开它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自然环境、文化环境,也会枯萎,也会失去原来的美。《乌布西奔妈妈》活态语境的渐趋丧失,是满族社会历史变迁和现代文明带来的结果,遗憾而无奈。

一般而言,民间文学作品大多有一个较为集中的流传地区,构成其传播的基地。《乌布西奔妈妈》随着东海女真人后裔内迁传入东北地区后,虽一度受到满、汉文人和满族族众的关注和热爱,史诗的传承被置于一个以汉文化为主流文化的新的社会环境中。随着满族汉化进程的加快,满语的逐渐废弃,《乌布西奔妈妈》在后期传承中,已经逐渐由原来的以民族语言为基础转变为以汉语为主,间杂满语的新的传承机制。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上半叶,国土被沙俄鲸吞,故地丧失之痛,激发了内迁东北各地东海女真后裔、满族族众以及包括汉族在内的诸民族的爱国情怀,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环

^① 转引自潘定智《民间文学生态简论》,《思想战线》1989 年第 1 期。

境使史诗作品被赋予更多的功能。对于东海女真后裔而言,《乌布西奔妈妈》成为他们寄托对故乡、对祖先怀念之情,唤起与守护族群集体记忆的有效途径;对于满族族众来说,《乌布西奔妈妈》成为凝聚族众,维系民族情感的重要方式;倾听、整理与讲唱史诗也成为东北各民族爱国人士抒发痛失国土悲愤心情的渠道。这些无不彰显出《乌布西奔妈妈》在满族先民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的特殊作用。正因如此,《乌布西奔妈妈》一度备受满、汉等族文人的重视。文人参与作品的修订、整理,成为史诗后期传承的重要特征,对史诗文本的最后定型和史诗流传范围的扩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乌布西奔妈妈》现有文本的形成,即是在上述背景下实现的。作品前后期传承特点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是东海女真人的社会发展及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变迁的结果。这种独特的发展道路也决定其所呈现的特色迥别于其他英雄史诗。

《乌布西奔妈妈》艺术表现形式别具特色

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英雄史诗一样,《乌布西奔妈妈》的叙事模式也是顺时结构。但作品在情节结构、故事结局、主人公乌布西奔及其弟子的人生命运等方面,与其他英雄史诗不尽相同,具有鲜明的特色,取得了特殊的艺术效果。

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英雄史诗大多以主人公成功凯旋,欢庆胜利的“大团圆”结局,使英雄人物的命运带有喜剧色彩。如《江格尔》中的英雄百战不死,最终保卫了宝木巴的安宁;格萨尔从天界下凡,在人间建功立业,完成使命后被众神接回天界;在伊玛堪《香叟莫日根》中,也是以英雄凯旋、娶妻,率众归故乡为结局,一片欢乐祥和的景象。

在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中,只有《玛纳斯》是一部悲剧史诗。有学者指出:“无论是它的英雄人物的命运还是故事冲突,都充满了令人叹惋的悲剧性和悲剧的基本特征。英雄的悲剧性,主要表现在玛纳斯及其子孙、勇士等充满悲剧性的命运方面。一生英武过人的玛纳斯,没有死在沙场,而是在欢庆宴会上被偷袭的敌人杀害,这是一场由喜剧衍生的悲剧;失去了父汗玛纳斯庇护的赛麦台依,险些被篡权的祖父和叔叔谋害。在巴卡依老人的协助下,他果敢地惩罚了篡权者并报了杀父之仇,杀死了卡勒玛克人的首领吾昆尔。但是,这位盖世英雄却被他的亲如手足的勇士坎巧绕阴谋杀害。”^①《乌布西奔妈妈》虽不同于《玛纳斯》具有典型的悲剧性,但作品对主人公乌布西奔命运的安排,也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综观乌布西奔的一生可谓悲喜交织。她既是一位成功者,一生征战无数,降服诸部,统一了东海女真诸部,受到族众的钦敬和爱戴;同时,乌布西奔的一生也充满悲剧色彩,这一切主要来自她的非凡出身,她一

^① 丁帆主编《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449页。

生对信仰的恪守和对理想的追求。乌布西奔生下来即是一位哑女,其失声的原因,是在她作为天界神灵被派至人间前,将喉咙声音留给了送日女神和托日女神,以便她们能够准确报时;她的童年也充满苦难。

乌布西奔一生虽取得巨大的成就,但个人生活并不美满。乌布西奔是一位情感极为丰富的女性,重情重义。她一生得到几位男子的爱慕,对他们倾注了一腔深情。其中她与一位来自外海的英俊男子琪尔扬考的感情至深至切。该男子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被海潮冲到乌布逊部落所在的海边。因其自幼无依无靠,相貌伟岸俊朗,加上来自遥远的外海,见多识广,深得乌布西奔的疼爱,视为“海宝”。两人情投意合,深深相爱。为安抚琪尔扬考思乡之情,并完成寻找太阳出升之地的夙愿,乌布西奔派亲信随琪尔扬考探海远航。在离别的日子,乌布西奔思念与焦虑相伴随,特举行隆重的海祭为之祈福。当得知琪尔扬考一行在海上失事的噩耗,更是悲痛万分,“梦寐以求要找回心上人”。^①作品生动地刻画了乌布西奔重情痴情的一面。然而,对于这样一位具有炽热情爱的女性来说,虽曾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爱情,却“都未能入身而长逝,孑身一生”^②,不能不令人叹息。

乌布西奔最终的命运也是以悲剧告终。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为了寻找太阳出升的地方,乌布西奔一生执着于探海事业,渡海逐日是她后半生的主要追求和终极目标。为此,乌布西奔的爱人琪尔扬考和她的几位爱徒都先后死于探海途中,乌布西奔本人一生经过无数次战争,为部族的生存与发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但最后并不是死于征战,而是死于旨在寻找日出之地的探海活动。可见,《乌布西奔妈妈》的悲剧性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理想主义和宗教色彩,彰显了主人公乌布西奔一生富于牺牲、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怀,展现了她与众不同的精神追求,体现了一种悲壮之美,取得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

英雄史诗的永恒魅力在于塑造一个个具有英雄气概、个性鲜明的英雄人物,体现一种崇高与庄严美。《乌布西奔妈妈》构成中国北方英雄史诗带的重要一环,在满一通古斯语族的英雄史诗中尤具有代表性,并以鲜明的特点,在世界史诗园林中独树一帜。

本文系吉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阶段性成果。

(郭淑云,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

【责任编辑:毛巧晖】

① 鲁连坤讲述,富育光译注整理《乌布西奔妈妈》,第 142 页。

② 同上。